

“无序的更新”：战后布里克斯顿的住房危机与治理转向

李宇豪 刘恒芝

上海师范大学, 中国·上海 200233

摘要：二战后，伦敦布里克斯顿因作为西印度移民的主要聚居区，长期面临严重的住房危机。政府失败的重建计划留下了大量空置房屋，反而催生了以“占屋”为代表的社区自救运动，由此引发的社会冲突使治理转向以市场为主导的更新方式。尽管这重塑了街区形象，但并未解决结构性的住房困境。

关键词：西印度移民；占屋运动；布里克斯顿

"Disorderly Renewal": The Housing Crisis and Governance Shift in Post-war Brixton

Li Yuhao, Liu Hengzhi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Shanghai 200233

Abstract: Post-world war II, London's Brixton, as a major settlement for West Indian immigrants, faced a long-term and severe housing crisis. Failed government redevelopment plans left behind numerous vacant properties, which in turn sparked a community self-help movement epitomized by "squatting". The resulting social conflicts prompted a shift in governance towards market-led renewal methods. Although this reshaped the district's image, it failed to resolve the structural housing predicament.

Keywords: West indian immigration; Squatting movement; Brixton

0 引言

今天的布里克斯顿是英国加勒比文化的象征，但这片街区充满活力的多元身份，并非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根植于战后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冲突与空间斗争之中。这次斗争的核心，在于战后英国的城市更新与住房政策，这些政策在布里克斯顿不仅未能缓解危机，反而成为了危机的一部分。

因此，对布里克斯顿的案例分析，不仅是对一段地方历史的重述，更是理解战后英国城市困境的一个典型样本。它集中反映了福利国家政策的局限性、移民的空间抗争以及内城空间政治的复杂性。通过剖析这一历程，本文旨在为理解当代城市的多元与冲突提供必要的历史视角。

1 区位与形成：从郊野到南伦敦的商业与移民枢纽

布里克斯顿位于伦敦内城南部，其城市化进程由 19 世纪以来的交通建设所驱动。持续的铁路与公交投入，使其从伦敦南郊的乡村地带，逐步确立为南岸一个关键的商业与换乘枢纽。与交通并行的是居住空间的大规模扩展，其核心是维多利亚时期建造的、易于分隔出租的联排住

宅。到 20 世纪上半叶，商业、居住与市政住房交织的城市结构，为布里克斯顿在战后成为理想的移民落脚点提供了可能。

二战空袭对当地住房造成了严重破坏，战后紧张的财政又使得修复工作仅能维持基本功能，导致许多房屋陷入失修与过度拥挤的恶性循环。与此同时，英国的战后重建产生了巨大的用工需求，政府为此采取了法律保障与定向招募并行的策略：1948 年的《英国国籍法》保障了加勒比居民自由移居的权利，而伦敦交通局等公共机构则直接在当地展开招聘^[1]。

以 1948 年“帝国温德拉什号”抵达为开端，大批加勒比移民来到伦敦。在经历了初期临时安置后，寻找长期住所成为移民最迫切的需求。布里克斯顿因其便利的交通、成熟的商业以及易于分租的住宅，成为了他们最现实的选择。然而，在普遍的住房歧视下，移民们不得不依靠彼此间的联系，逐渐形成了一个互通有无的消息网络，以对抗充满敌意的市场环境。正是这种以互助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将最初零散的落脚点编织成一个稳定且高密度的聚居区。到五六十年代，布里克斯顿不仅成为了西印度移民的关键

落脚点,更成为“黑人伦敦”的文化与象征中心。

2 双重排斥下的社区:公共住房与私人市场的困境

战后布里克斯顿的住房困境,其根源在于西印度移民群体遭遇了公共与私人领域并行的“双重排斥”。在公共住房领域,兰贝斯区看似公平的分配制度,因其对居住年限和积分排序的严苛要求,系统性地将新移民拒之门外。地方当局声称其政策不分族裔,然而这种“中立”原则在实践中,却导致新移民群体长期滞留在等候名单的末尾。即便少数家庭得以入住,也往往被分配到条件最差的房源^[2]。一个本应提供保障的公共体系,实际上造成了事实上的居住隔离。

在私人市场,情况同样严峻。移民普遍遭遇房东和中介公开或隐性的种族歧视,不仅租金更高,还常被直接拒租。融资困难也阻碍了购房的可能,迫使少数有能力的移民房东不得不将房产过度分隔出租以维持生计。这种个体为求生存的无奈之举,其累积效应便是整个街区普遍的居住拥挤和房屋失修^[3]。

公共住房的排斥与私人市场的歧视的共同作用下,布里克斯顿的居住环境持续恶化,其对外形象也随之下降。更严重的是,地方当局的治理观念发生偏移,逐渐将本源于住房困境的社会问题简化为治安问题,加剧了警民关系的紧张。到 70 年代末,一个尖锐的矛盾现象出现了:一方面是官方数据证实住房等候名单持续延长,劣质住房比例远超平均水平;另一方面却是街头随处可见因规划失败和投机而闲置的空屋。在这种所有正式渠道都被堵死的绝望背景下,“占屋”几乎成了唯一的选择,它既是生存策略,也是一场将住房危机强行推上公共议程的政治行动。

3 从占屋到骚乱

20 世纪 60 年代末,深受现代主义规划思潮影响的大伦敦议会将布里克斯顿定位为大规模重建的前沿阵地。当时,规划界普遍将维多利亚式街区视为社会问题的根源,主张以高层建筑和立体交通等来进行清拆重建^[4]。布里克斯顿计划通过修建高层塔楼、六车道主干道和大型购物中心来彻底重塑城市空间。为实现这一目标,兰贝斯区议会开始成片征收私有产权。然而,这一宏伟蓝图因两个因素而迅速失败:其一,高昂的成本使其在 1968 年失去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其二,该计划因破坏商业生态、平价住房的流失及破坏历史风貌而遭到社区广泛抵制。

规划的搁浅与社区的反对,共同造成了长期的治理僵局,其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在街头留下了大量被政府征购后

又无人管理的空置房屋。官方数据显示,到 70 年代初,布里克斯顿的空置房屋数量已激增增至 5000 多栋,是十年前的两倍有余^[5]。在此背景下,占屋从生存策略迅速演变为一场深刻的社会运动。1969 年对布里克斯顿路一座办公楼的公开占用,成功地将议题从“非法侵入”提升为一场关于房屋“使用权”与“产权”的政治辩论。此后,占屋运动在布里克斯顿迅速发展,并逐渐形成了高度组织化的民间网络。其中既有以南伦敦同性恋解放阵线(GLF)为代表的青年团体,他们占用维多利亚式排屋,建立住房合作社与社区中心,致力于构建另类的社区生活模式;也有以奥利弗·莫里斯(Olive Morris)为代表的黑人群体,他们将争取住房权利与反种族歧视及反警察暴力相结合,并创立了著名的“121 中心”。

占屋运动的壮大,在 70 年代中后期一度迫使官方做出有限让步,例如允许部分团体转型为住房合作社,以“临时许可”换取暂时的稳定。然而,随着 1979 年撒切尔政府上台,英国政治风向右转,地方财政紧缩,对“公共秩序”的强调压倒了对社会福利的关注。地方当局与警方的治理重点转向强硬的驱逐与清退,与占屋者的对抗随之升级。最终,积累已久的住房问题,加上警察与当地居民的紧张关系,在 1981 年 4 月的一次集中整治行动中被彻底引爆。这次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一次警方的集中整治行动,随后迅速演变为当地居民与警察之间的大规模街头冲突。

4 政策转向:从国家干预到市场主导

1981 年四月的骚乱,将布里克斯顿的社会矛盾推至全国视野的中心。作为回应,官方发布的《斯卡曼报告》明确指出了恶劣住房条件等深层的社会经济背景,并强调住房保障的重要性^[6]。然而,与报告倡导地方修补的思路相悖,撒切尔政府选择了另一条道路。自 1980 年起推行的“购房权”计划,标志着国家住房政策的根本性转向。该计划以财政(减少维修管理开支)和政治(削弱工党选民基础)为双重考量,通过大幅折扣鼓励租户购买其租住的市政住房^[6]。

对兰贝斯这样的地方议会而言,这项全国性政策的后果是灾难性的。最优质的房源被售出,剩下的市政住房质量越来越差,而等候名单却日益延长。更严重的是,中央政府立法限制地方议会使用售房所得来新建或修缮住房,彻底切断了本地住房体系自我更新的可能。在此背景下,伦敦的无家可归现象在八十年代显著恶化。地方议会在财政紧缩下,被迫将有限资源集中于“优先需求”人群,并将对待占屋的态度从有限协商转向强硬清退。住房问题日

益被界定为秩序问题，治理重点全面转向清理与管控。

进入 80 年代末，一系列新的立法进一步推动了公共住房的私有化。通过所谓的“自愿转移”，大量市政住房被移交给新兴的住房协会，这直接导致了地方住房体系的瓦解，布里克斯顿的住房管理也因此变得碎片化。尽管中央政府力推的“住房行动信托”模式因社区抵制未在当地落地，但其背后“借整修之名、行变卖之实”的意图，明确预示了公共住房的未来走向。

进入九十年代，政府的治理思路再次调整，从宏观私有化转向更为灵活的公私合营模式。“城市挑战”计划应运而生，鼓励地方以竞标方式获取重建资金。1993 年，兰贝斯区成功为布里克斯顿竞得为期五年的项目资金。该计划不再追求大拆大建，而是交由一家独立公司负责，通过修复街区、提升商业与公共空间品质来提振市场信心，其标志性工程便是丽兹影院。然而，这种更新模式因其资金主要投向商业项目，对最核心的住房问题贡献甚微而备受批评。最终，它虽为街区注入了消费活力，却并未触动深层的住房困境，反而为下一轮更剧烈的绅士化进程拉开了序幕。

5 结语

总而言之，今天的布里克斯顿常被描绘为多元文化成功的象征，但其历史清晰地表明，这一独特身份并非平稳演化的产物，而是形成于深刻的社会冲突与空间斗争之中。这一过程体现了当代城市的核心矛盾：从“温德拉什一

代”在制度夹缝中求生，到占屋运动者以直接行动挑战产权，社区始终在为基本的空间“使用权”而持续抗争，并抵抗着福利国家的局限与空间的商品化。如今，这场关于空间归属与社区认同的斗争，正以绅士化这一更隐蔽的形式延续至今。

参考文献：

- [1] Peach C. West Indian Migration to Britain: The Economic Factors[J]. Race, 1965. 7(1), 31-46.
- [2] John Rex and Robert Moore, Community and Conflict: A Study of Sparkbrook, [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
- [3] Sheila Patterson, Dark Strangers: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Absorption of a Recent West Indian Migrant Group in Brixton, [M]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1963.
- [4] John Boughton, Municipal Dreams: The Rise and Fall of Council Housing, [M]London: The Bodley Head,2018.
- [5] Leslie Scarman, The Brixton Disorders 10-12 April 1981: Report of an Inquiry, [M]London: H.M. Stationery Office,1981.
- [6] Ray Forrest and Alan Murie, Selling the Welfare State: The Privatization of Council Housing,[M] London: Routledge,1988.

作者简介：李宇豪（2001.01-），男，河北邢台，汉族，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国城市史。